潘年英

百年高坡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11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 百年高坡 | 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

贵州人民出版社

K280.73-53/K281.6
W800
211

贵州人民出版社

百年高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图书馆

0072696

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潘年英

责任编辑　奚晓青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夏顺利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百　年　高　坡
——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
潘年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5 插页　19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221－04084－2/C・41　定价：11.70 元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内 容 提 要

高坡为贵阳市郊的一个苗族自治乡，距贵阳市仅48公里，但生活状况却与贵阳市有极大差别，一边是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另一边则是极端贫困的原始乡村。一个位于现代都市边缘的民族社区，何以与现代文明如此格格不入极不相容呢？本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高坡社区经济贫困和社会后进的历史、文化渊源，向读者揭示了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情景。

E68/14

China

A Summary of vivid Life of the Miao in the Central Guizhou— Gaopo

Gaopo, an autonomous Xiang, i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of Guiya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there are far behind Guiyang, even though it is only 48 Km away from this modern inetropolis. Gaopo still remains an extremely poor and primitive rual area. Why is there such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a modern city and its rural neighbor? Why is an ethnic community so differeat from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nearby?

In the book, the poverty and its backwardness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origin of its culture are surveyed from the angle of authropology, showing the reality of the Miao's life here in the central Guizhou.

·前　言·

高坡是贵阳市属的一个苗族自治乡，乡境内有苗、汉、布依等多民族杂居，其中苗族人口居多，占总人口的67.2%，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历史上，高坡原来为苗族世居之地，高坡的山水土地哺育了世世代代的苗族人民，苗族人民也创造了高坡丰富多彩而神秘奇特的文化。

大凡到过高坡的人，都不难获得这样一种印象：山高路险，谷深坡长；气候多变，土地贫瘠；在绵延起伏的喀斯特地貌上，田园点缀其间，而庄稼生长艰难；炊烟升起，村庄出现，仔细看时却不过是几间低矮简陋的草房，房内四壁空空，而人畜同室，他们都睁大着一双善良而沧桑的眼睛，打量着陌生的来访者。毫无疑问，这儿给人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贫困。贫困，似乎也成了当地最醒目而显著的风景。

但这样的贫困景观似乎又是极其不可思议的。高坡距美丽富饶以至甲于天下的花溪区，不过31公里，距省城贵阳，也不到48公里，乘车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作为省会城市，贵阳当然毫无例外地具备着一切现代都市共有的文明特征：林立的摩天大楼，高耸的立体交叉桥，川流不息的汽车，永无终结的宴席，霓虹闪烁，灯红酒绿，大街上行走着形形色色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大款，电视里每天都报道着这样“翻番”那样“腾飞”的消息——不用说，这一切都正

China

好与50公里之外的高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似乎呈现出人类文明的两极景致——最原始的和最现代的。这景致的确使人困惑不解难以理喻。

因此之故，高坡在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这当中，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①] 下至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志于探求高坡历史奥秘的专家学者和学生，都无不对这片地域倾注极大的热情。人们在议论高坡，评说高坡，研究高坡，这不仅使高坡越来越闻名于世，而且也使高坡越来越富有神秘的魅力。

自然，高坡的魅力不唯是贫困而已。由于地理环境的天然屏闭，加之因历史形成的民族性格的保守性和封闭性，高坡苗族至今保存着极为古老迷人的传统风俗。这里有神秘的洞葬和悬棺，有精采动人的斗牛、跳花场、射背牌等古老习俗，在世界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当今社会中，这些古老风俗更显现了其独异的光彩。这一光彩使经济学家看到了振兴高坡经济的希望，使旅游专家和投资者看到了高坡的开发价值，也吸引着成千上万想领略这奇特风俗的中外游客。因而近年来，高坡不仅为人们广泛传颂和津津乐道，而且还成了投资者投资开发的热点并日渐成为旅游热点。

当然我不得不指出，对于众多的来客而言，向往高坡或游览高坡，都不过出于一种好奇心而已，或者仅仅就是为着满足一睹人们久为传言的神秘之地。而对于高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今日现实状况构成的原因，人们却缺乏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这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内，他们对此也缺少应有的热情，有时他们也从百忙的事务中抽一点空隙时间到高坡走走，看看，问问，但也仅此而已。倒不如一些身居海外的有识之士，他们虽然并没有到过高坡，但凭借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对高坡有着更多更深刻的了解。

---

① 1991年12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到高坡视察，详情见当日《贵州日报》、《贵阳晚报》有关报道。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样，认真说来，真正有志于研究高坡这片地域和民族历史文化的人并不很多，乃至我们可以明确到极为有限的几个[1]——这也是形成今日高坡研究资料极为贫乏的原因之一。我不幸或有幸成为高坡文化研究者中有限的几个人之一，说起来这当然要归之于一种学术的缘份，设若当初我一开始就执著追求着文学创作而彻底放弃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又设若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省文联没有计划出版这样一套有关贵州民间文化研究的丛书，再设若后来没有余未人前辈及徐新建君的极力促成和怂恿，我今生今世也许永远不会想到要去调查高坡，研究高坡，也不能做到像现在这样身体力行地去了解高坡和认识高坡。

然而事实上这缘份早就结下了。1994年底，我在接受了这一课题任务的时候，脑子里很自然地闪出这样一个题目——《百年高坡》，这题目现在成了我这本书的书名。在这里，"百年"当然仅仅是一种象征，其只代表着一种较长的时间概念，而不能理解为确指的一百年。事实上本书所考察的高坡历史远远超过五百年，甚至八百年、一千年。而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虚拟的时间概念，"百年"也内涵着一种从古到今由远及近的文化变迁。本书的副题原拟为"对一种'飞地'现象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考虑到人类学由于其过分专业的学术规范和操作方式，使得其在当今日益鲜活灵动的学术领域中，日渐丧失其本来应有的广泛读者，我决定取消这个副题，而直接更名为"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当然"黔中苗族"远比"高坡苗族"的内涵广泛，但考虑到"高坡苗族"之于"黔中苗族"亦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认为以高坡苗族作个案的调查而冠之以"黔中苗族"的概称，应似无太大的不妥。而所谓"真实生活"，我显然是

① 据我所知，对高坡有较深入调查的学者一个是建国前西南联大的罗荣宗教授，一个是建国后的杨庭硕先生，此外像张惠果、牟代居等人也曾到高坡作过专门的调查。

China

想表明自己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和态度——做为一名现代的人类学家，我必须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当然，另外的一层含义，显然即是指我将会偏重于记叙和描述，而不想过多地展开议论——我把这个工作留给读者了。

既然是对高坡苗族生活的一种真实描叙，我当然把重点放在对高坡苗族传统文化的清理和复原两方面。所谓清理和复原，即是把现代高坡苗族千头万绪杂乱无章的生活作出疏清理顺，使其呈现本来的面目；从而找出其各种文化的源头——时间总是无情地改变着一切，文化世界更是难于幸免，我们只有找到各种文化的源头才能看清其流变的轨迹和规律，从而最终认识到苗族文化的整体构成。

当然本书最终的落脚点仍在当代。在我看来，一切学术研究都不应回避对现实问题的回答。高坡苗族目前面临的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即是贫困。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其如何形成？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消灭贫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本书一开始就确定的学术目标，相信这问题的答案也能对高坡之外的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乃至情况与高坡苗族类似的各民族都有所帮助和启迪。尤其希望能对政府当局在实施扶贫计划的战略部署上有所帮助和启迪。

关于本书的这一学术目标的确立，我似乎有必要再叨絮几句，事实上这涉及到我对近百年来人类学发展史的认识。我们知道今日的人类学与早期的人类学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甚至一些早期的作为这一门学科的真正奠基者的名字也渐渐为我们所遗忘，提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维塞利亚斯(Vesalius)、泰森(Tyson)、普里查德(Priehard)、林奈(Linnaeus)、培丰(Buffon)和鲁门巴哈(Blumenbach)，我想了解他们对人类学所作的贡献的人恐怕不多，但实际上他们所建构的人类学的基本宗旨和思想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改变——这就是研究人类本身。后来人类学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五花八门的学术派别，其研究范围也被无限扩大，以至与其

China

他学科的界线变得模糊而难以分别。与此同时人类学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倾向，即由于研究方向的过分的专门化而使得该学科的领域变得非常狭窄。他们或迷恋于心理学，或沉醉于习俗和宗教，更有甚者，他们倾其一生的精力专门研究某一种语言——我丝毫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他们在学科上的巨大贡献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永为我们所敬仰。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人类学后来过细的分流使之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也越来越远离对人类现实社会本身的关怀，这使人类学几乎走入末途。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类学被定义为是研究非西方部落民族的科学。这一状况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更为有害的是，在他们研究非西方部落民族的过程中，观点早已存在于自己的思想之中，而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到非西方部落民族那里找到一些证据，用以证明和维护自己原有的观点。伟大的博厄斯(Franz Boas)就是这样做的，在本世纪初20年代那场激烈的文化辩论中，他授意自己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到南太平洋的西波利尼西亚调查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当时米德年仅23岁。她带着导师博厄斯给她所列的详细的调查提纲，踏上了去萨摩亚的旅程，结果不言而喻，米德带回了令导师博厄斯十分满意的他所需要的材料。3年之后，米德的著作出版，她在书名中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她研究的方向和目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米德的研究结果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认为由于文化的因素而使萨摩亚少女没有青春期焦虑的结论，做为人类学上的一个“反面实例”，改变了人们一贯认为的生物机制决定论的观点。事隔数十年之后，一位名叫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的人类学家重新调查了萨摩亚，结果他得出了与米德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例子几乎粉碎了人类学美丽的神话和梦想，也差不多断送了这门学科的前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非西方的文化，大多数的人类学家

China

仍在为着证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进行着扎实科学的田野考察。但不管怎样，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看待非西方文化，人类学始终无法走出沉闷、死寂、呆板的学术气氛。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出现及他对田野作业的强调，似乎给人类学黯淡的前途带来了一线生机，和他前面的大师相比，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片面而枯燥的理论的扬弃以及他身体力行的田野考察，无疑是对传统人类学的一次大背叛或大发展。在中国，费孝通的工作则做得更彻底，这位马氏的关门弟子，在导师的言传身教中，显然看到了人类学只研究所谓"野蛮"民族的巨大局限，于是他推出了一部直接面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田野考察报告——《江村经济》，这部著作后来成了人类学史上不朽的名著，但我们已经看到，他对经济的关怀，就似乎远远背离了传统人类学的主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一直都在向前推进和发展，而每一次大的转变和跃进，同时也意味着是一次大的背叛和决裂。这也正是人类学近百年来始终获得勃勃生机的原因之一。从最初的传教士和旅行家们的游记，到专业的关于"野蛮"社会的田野考察，到今日直接面向当代社会生活，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了一门最具魅力的显学。毫无疑问，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学术背景的影响下的一次回应和实践。为了使学者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我把本书的学术目标确立在对苗族当代社会生活的考察和研究上，而且把问题的核心置于人们久久探求又终无答案的所谓"贫困"。这样，我们不难看出本书的基本思路，即是通过纵向的历史文化的考察，来理清苗族文化发展的脉胳，而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叙以及相关的横向比较研究，来考察其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律，从而使我们对于苗族数百年来的生活状况有一个较为真实的了解。

我是在 1994 年底正式接受这一课题任务的，从那时起到 1995 年 5 月，我便大量搜集和研读有关前人的研究资料，使我深感惊奇的是，原来前人对这一社区早已有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

Chin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研究，可见这一社区从来为人们所关注而不寂寞。而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我以为杨庭硕的研究最为系统而深入。杨于1967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攻读西南边疆民族史，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江应梁教授。杨的硕士论文即是研究黔中苗族历史的，其中不少篇幅涉及到高坡社区，杨为写作这篇论文曾数次深入高坡采访调查。他的调查系统而扎实，阅读他的调查报告使我感到他似乎更有理由做本书的作者，而更重要的是他给我提供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高坡苗族的生活情况。这使我的研究获得了系统而连贯的线索。历史上关于这一社区的记述也史不绝书，各种方志、野史同样使我获益匪浅，但更主要的工作还是自己亲身的调查。从1995年5月到9月的5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在高坡作田野考察。记得5月间初上高坡时，高坡人还正在插秧，春风轻拂，杨柳依依，高坡的田野到处是葱葱郁郁的景象，而9月间最后一次去高坡，高坡人已经在收割稻子了，秋阳冉冉，天高云淡，极目之内已是一片灿烂的金黄色。当然这5个月中我并不全在高坡，因为还有别的工作，我不得不经常地返回贵阳。这样一来，事实上我在高坡调查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就只有一个月。这样的一点时间对于本书写作所需调查的真正时间来说自然相差甚远，因而严格说来我的调查也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调查。但限于种种条件的制约，我似乎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高坡调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次非常艰苦也非常认真的调查。首先是我的身份在当地很不受欢迎，对于乡政府来说，我的工作与他们无关，因而在说了几声“欢迎欢迎”之后，他们就完全把我撇在一边了，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更不愿理睬上边过多的“访问者”——他们有限的收入不足以承担这些。每到一村，村干们总是对我抱怨，他们的报酬太少（高坡村干每月报酬为50元）而工作量太大应酬接待也太多（每月用于接待来访者的开支为200元以上）。所以我经常受到冷遇。而我发现，若是以政府

China

名义下去的人，他们尽管内心里并不欢迎，但仍要努力加以认真接待，我想这本身也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对我这样的身份就大可不必了，当他们听我介绍说是“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们便会表示理解地补充一句说：“噢，放假了，你来实习的。”他们显然是把我当成“学院”里的学生了。事实上也常有学生在高坡进行社会调查，在我之前，就有一群贵州民族学院的学生在那里搞调查。他们是为完成毕业论文而去高坡的。这样一来，许多时候，我成了不速之客，亦不被他们所欢迎。接下来的问题是我的吃、住都遇到了困难。因为农民仅仅把我看作一个为写毕业论文而下去搜集素材的学生，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义务和责任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指盼着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我能很快离开，因此他们并不为我准备早餐或中餐，好几次我从早上一直工作到下午三、四点钟仍没有得到饭吃，这就不能不说给我的调查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当然后来随着我和农民的交流日渐增多，他们对我的工作性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种情况也慢慢得到了改善。调查期间我始终带着一个斗笠，晴天可以遮太阳——高坡海拔高，太阳辐射非常厉害，雨天可以挡雨。斗笠是我从黔东南老家带来的，和当地农民的斗笠大不相同，所以只要一看到这斗笠，他们便会说：“哎，他又来了。”语气中含着一种故人重逢般的亲切。苗族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只要了解到来访者到来的真实目的——也许最初他们把我当成是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人了，或者把我看作是邻村偷牛抢马的坏人（这一带近年来社会治安极差，偷盗者或抢劫者经常出现，在我调查期间即亲自目睹了数起抢劫案）——他们便会对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几次我在高坡场坝赶场，遇到几位农民，他们亲切地给我打招呼，但我想不起他们了，不知他们是哪村的人，他们却笑道：“哎，你把我忘了？那天你是在我家吃饭的。”然后他帮助我回忆起一些细节，于是我恍然大悟，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拉着他们到路边的小店去喝酒……这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有时受了不少委曲，体验到各种最

China

艰苦的生活，但和农民在一起，更多的是亲切和愉快。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走遍了高坡的18个行政村和89个自然寨，尽管每个村都通了公路，但由于并无班车，我只好全部坚持步行，老实说，我走烂了一双崭新的旅游鞋。当然这一次旅行，比起1994年10月我在月亮山的旅行来，情况就好得多了。月亮山为广西九万大山的余脉，地形切割强烈，山高坡陡，谷深路险。由于村寨与村寨之间距离太远，每天都得不停地翻山越岭，所以每到一个村寨，人都会走得筋疲力尽。而高坡不同，高坡是一个台地，虽然也山高谷深，但这主要是指台地的边缘，而台地之上，即高坡乡内的各个村之间，则尽为丘陵山地，坡度不大，道路亦平坦宽敞，且村寨均为小聚居形式，每走5～10里路即可见到一自然村，这就使我的调查比起月亮山的调查来要轻松得多。尽管如此，高坡调查，还是十分艰苦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遍18个行政村89个自然寨，访问数百户人家，记录下一百多个个案，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每从高坡下来，妻子都会对我说："又瘦了"或者"又黑了"。这是自然的，无疑会这样。由此我能体会到做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我要说，我的调查肯定是很不够的，时间仓促，调查也不够深入——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我能在高坡呆上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但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这本书肯定不能做到令我和读者都十分满意，而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遗憾。鉴于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高坡的书，我想这本书就权且抛作引玉之砖吧，我真诚期待于大家的教正并引来人们对高坡及高坡问题的热切关心。

China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吴家萃

执行主编　徐新建

编　　委　吴家萃　吴秋林　余未人　张建建

徐新建　奚晓青　章海荣　潘年英

总 策 划　余未人

China

貴州高原民間
文化宝庫打開山
門走向世界
費孝通
一九九五年十月

China

老年妇女的服装更接近传统样式。

着盛装的苗家小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China